

世界大众文化发展流变的“中国时间”逐渐到来

■ 学谦

当全球热议3A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惊人效果和中国的当代世界表达之时，我却想到这是一个终于到来的节点——它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工业和网络文艺不断演进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些学者、评论家长期观察和期待的预言成真。对于后者，我要提及的是最近阅读的一部书：70后文学评论家夏烈的《故事与场域——以网络文艺为中心》。

一份网络文艺15年的观察报告

夏烈在给我的作者题签中这样写道：“一份十五年的观察报告”。这些持续的、即时的观察与报告都跟当代大众文化中的重要一支——网络文艺的现场紧密相关，很多今天看来已被证明或展露成绩的现象，长期的观察者们早已预料并推出过观点与理论。

我有时想，像该书作者这样的70后文学评论家，一方面自然是传统文学艺术教育和工作伦理的传承延续，他们熟悉纸质媒介及文学经典，对此始终保持着温情和敬畏，这很容易让他们跟随此前代际的评论家与文学观进行思考并发表对时代文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又恰巧成长于旧媒介向新媒介全面转移、传统文艺逐渐向网络文艺移交阵地的历史过程中，无论体验和参与的细节，还是固守或跟进的选择，都会比此前代际和此后代际的知识分子更复杂、犹豫。

这些判断并非武断的。比如具体到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观察门类以及观察者身份，夏烈在《故事与场域》中就不倾向网络文学、网络剧、短视频，而非网络游戏、网络动漫这样更短促而向于玩家体验和二次元的内容；同时，他也确乎时不时地表露着一种媒介大陆裂变、文化权力更迭中的细部体感，比如他提炼道：“历经现场的人们，才会知道未来研究者和评论者认为合法与自然而然的描述、概括实际上充满了思想斗争和权力交割。”（《文学未来学》），“在中文学科内部盘桓费心那么多，这实际上折射了我所处的‘中间物’或者过渡者的状态。”（《态度与方法》）。可即便如此充满敏感和自省的意绪，我从《故事与场域》的阅读中所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超前的判断能力和理想主义在数字文化时代依旧具有的引渡和穿透力。换言之，夏烈经由逾15年的网络文艺领域的“服役”，早已跳脱了传统评论家的身份圈套，呈现出一种“新文学学者”的转变可能。

理想主义的预言最终成真

关于理想主义，首先表现在他2008年的文章中，这是《故事和场域》一书作



根据猫腻网络小说改编的爆款电视剧《庆余年》剧照 宁波出版社 杭州出版社出版

为编年体文集的最早篇什。参之以夏烈过去的另一个个人化网络文学史述《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2008年的文章及其立场基本来源于他2006年末开始介入的中国网络文学现场工作，那时的网络文学尚没有摆脱“线上成名，线下出版”的模式，也谈不上进入时代主流文学的序列，是一些像夏烈这样的敏感开放的评论家将之迎入了主流化的轨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作者开始判断正在冉冉升起的网络类型小说可能是新世纪中国的“一时代之文学”，并表示“网络文学就是未来的主流文学”。除了分析过往文学史家所谓“一时代之文学”的特征以对照网络文学外，作者认为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允诺”和“相信”这样的时代创作可以代表新质的中国文学，以及承载当下及未来的国人精神、人类精神。

从传统文学领域的下里巴人，到互联网时代的文学高峰，大多数批评家看到的是差距，但少数人却感受到关联。这中间的差别如果说在于文学观的相悖，倒不如说来自于理想主义气质和愿景的多寡。所以在《故事与场域》中，你总能看到作者从人类文学史的惯例经验、哲学意义上数字时代的“造物”原则、传播层面上的媒介赋权、文学定义上的“故事传统的复活”等，来解释和引领网络文学的巨大合理性及可能性。

网络文学研究的实操者

当然，理论不应脱离实际，事实上夏烈也是国内较早一批网络文学研究者、评论家中最讲究从实践出发构建观点和理论的人物。以至于禹建湘在近期《中国网络文学十大批评家》中径直把夏烈那章定名为“网络文学研究的实操者”。那么，在《故事与场域》中可以看到的第一类“实操”是作者以具体网

络作家作品为评价对象的细读与案例分析。比如由猫腻的长篇封笔之作《大道朝天》引出的猫腻小说的“两类作品、两股传统”；玄幻的《朱雀记》《庆余年》《将夜》《择天记》和科幻的《间客》，他有趣地指出了猫腻的“神经三部曲”——《庆余年》《间客》《大道朝天》的内在关联，对于猫腻将“玄幻+科幻”加以联接，作者认为“它不是外在的形式探索，而是内在的思想展开”。这些分析解读瞄准了所谓“大神”群体中的精品之作和精彩之处，将市场化和读写互动特点鲜明的网文背景下的优秀作家的“主体精神”及其思想性推选发扬出来，实际上在研究“网络性”的同时还原了“文学性”，“研究类型文学就是研究在当代网络文学场域学”的观点和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在网络文学、网络文艺现象、趋势、结构，以及进一步构建网络文艺作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组成部分的文化蓝图，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在《故事和场域》中，作者并非网络文艺一味的歌颂者，他不仅指出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更是对资本过度侵蚀创作、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绑架现代代社会生活等给予了一系列的分析和批判。在这一过程中，他又提出了“网络文学场域学”的观点和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在网络文学、网络文艺现象、趋势、结构，以及进一步构建网络文艺作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组成部分的文化蓝图，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景”。这些描述不仅是今天网络文学“出海”的普遍情景和诉求，也是国产网络剧、微短剧、游戏等强产业属性的新型文艺创作的普遍情景和诉求。夏烈认为，这预告了世界大众文化发展流变的“中国时间”逐渐到来，它将影响世界通俗文化“格局的重构”。

网络文艺的“未来学”

借由实践所引发的趋势性判断和预言，在夏烈的理论构想中出现了“文学未来学”这一词汇。这篇2013年发表的、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长文，现在看来，其当时的独特性、原创性被低估了。他在文章里谈到：“在文学未来学中，必须看人与宇宙、人与自然这两个维度的位置。科幻文学、奇幻文学、生态文学因此都应该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中国重要的文学作品将诞生于此，这类文学作品将直接使中国作品与世界作品同步。”“我想强调，未来的文学创作将会要求我们提升到一个新的智力水平和知识结构……当文学的未来有朝一日以近似物理学的十维空间出现的时候，汉语叙事或者说汉文化想象力，能做好准备吗？”上述维度和品类的创作在当下正不断涌现。

在《故事和场域》中，作者并非网络文艺一味的歌颂者，他不仅指出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更是对资本过度侵蚀创作、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绑架现代代社会生活等给予了一系列的分析和批判。在这一过程中，他又提出了“网络文学场域学”的观点和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在网络文学、网络文艺现象、趋势、结构，以及进一步构建网络文艺作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组成部分的文化蓝图，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所以，当《黑神话：悟空》引爆全球文化舆论，当网络文学被视为与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剧等并列的“世界四大文化现象”，或许我们需要更多像夏烈这样的“新文学学者”，共同来做这份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高度结合的文化作业。

富矿新采

——写在“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出版之际

■ 钦文



“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 张帆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世纪80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收录了大量文献，记录晚清外交官、学者对国外的观察和记录，其中也不乏外人对中国看法的记录。世纪之交，以葛兆光和张伯伟为代表，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成为一个越来越为人所重视的学科。

近些年国内出版了不少译丛，关注晚清以降外国人对中国的观察和记录，有代表性的就有《西方的中国形象》（黄兴涛、杨念群主编，中华书局出版）、《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张明杰主编，中华书局出版）、《亲历中国丛书》（耿昇、李国庆主编，中国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南京出版社出版）等。

就中德关系和文化交往而言，近20年经过学者的努力，不少被埋没的珍贵文献也被陆续挖掘出来。“中德文化丛书”（叶隽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青岛日德战争丛书》（秦俊峰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译丛。当然，前面提到的几套丛书中也有德国人的作品。此外在德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些早期中国研究代表作也被译介到了国内，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商务印书馆出版）。

令人欣喜的是，近期，张帆主编的“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第一辑的前四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关注点在于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叙事。其中一本是译文选编，另三本是研究专著。二战前夕，为数可观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中国避难。近一二十年，国内相关的新闻报道和纪录片不少，国人对此已不陌生。在逗留期间，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报刊，例如《上海犹太纪事报》《八点钟晚报》《犹太信息报》等。受语言限制，加之年代久远，少有人关注，长期以来，这批珍贵的文献一直没有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近些年来，国内德语语言文学学者开始关注这些尘封的文献，陆续发表一些有价值的论文，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外文发表的，因而中文读者无缘接触，更不要说一窥报刊原文了。这套丛书的出版，弥补了这一遗憾。

丛书中的《德语犹太流亡者笔下的中国故事》就从上述犹太流亡报刊中选取了部分具有文学性的短小篇幅，如小说、随笔、诗歌等，也包括部分书信文字。这些文字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中许多关于中国的描述很有现场感，亲切活泼。毕竟作为犹太难民，与曾经的那些上层殖民者的生活状态不同，他们生活在底层，与普通的中国人接触交往比较多，其中有不少人主动融入中国社会。因此在他们的笔下，很多之前西方人（主要是上层和教会人士）向自己的同胞传播的那些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被打破了。而对于现今国内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这些兼具文学性和史料性的文字也给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往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在大众媒介的专业海外记者出现之前，人们关于域外的了解多半来自那些旅行者的讲述，而事实上，最早的一批驻外记者很多就是那些行走于异地的文人兼任的。德语文学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海涅。较之英法美等其他西

方国家，德国与中国的正式接触较晚，来华旅行的人也很少。随着后起的德国在华“利益均沾”乃至获取了殖民地，来华的德国人逐渐增多。在经历了一战的短暂停顿后，魏玛共和国时期来中国旅行的德国人明显增多。这股东方（包括中国）旅行热有几层背景：从经济角度来看，德国愈发看重与中国经贸关系，商旅往来日益增多；从文化层面来看，一战失败后，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对一直以来高歌猛进的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而迥异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文化似乎又一次提供了一种帮助西方文明走出困境的另类方案，故而中国实地观察成为了一种选择；此外，随着交通日益发达和旅行成本的降低，大众旅行开始兴起，相对富裕的市民阶层也开始将旅行的范围扩展到了遥远的东方。

魏玛共和国和德国语游记中的中国城市镜像》就是对这股中国旅行热的考察之作，该研究着眼点不仅仅在于描述游记中的中国形象，而是进一步探究这些中国叙事背后所反映出的心态。因此，标题中的“镜像”概念是准确的，因为在镜像中反映的只是观察对象的面相，也包含了观察者自己的精神面貌。作者揭示了这一时期的游记与以往关于中国的叙事不同，前者要么热衷搜集各种亦真亦假的见闻，要么力图汇总各种中国知识，或者以科学家、探险家、商务人士的身份记录个人体验，无论是哪一种，大体上都是以一种相对超然的态度。然而魏玛共和国时期来华的这些旅行者，他们大多带着自身的问题意识，将中国作为一面镜子，从中反观自我，折射出自身的矛盾心态。很多游记的作者本人就是现代性的怀疑者和批判者，而当时的中国正在努力参与到现代性的洪流之中，大都市正是这一发展进程的展开场域。

正如作者所言，作为工业化和现代性“被最为深刻地体验到的场所”，上海、广州、南京、北京这些“最早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中国城市”，“引领着中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为魏玛时期的德国旅行者提供了一幅观察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的绝佳窗口”。这些游记的作者在中国的城市里看到了“东方芝加哥”，看到了资本主义在古老东方国家的迅速发展，看到了殖民主义的种种怪相。此外，这些德国人对“民族主义”的思考也渗透在了他们对德国民族主义的观察之中。对西方文明抱有疑虑的德国人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甚至发出他们有关“人类共同体”的乌托邦想象。虽然这些想象并非无源之水，但在中国的体验和经历，强化了他们的乌托邦设想。

丛书中的《德语左翼作家笔下的中国叙事》和《德国巴伐利亚馆藏文献中的中国叙事》与前书一样，都是基于具体文本研究的研究，借助最新的理论框架展开论述，有点有备有纵深。这两项研究所依托的文献堪以富矿，很值得后来的学者继续深挖。

丛书的主编张帆教授供职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这套书也可以视作学科传承和发展的明证。近20年前，卫茂平教授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问世，这是国内该领域第一部系统研究之作，书中随处可见有关“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叙事”的描写和评述。然而当年书中涉及的很多作品在中文世界鲜为人知，也没有中译本。经过一两代学者的努力，如今不少书不仅有中译本，而且论文和专著迭出，译者和作者大多是新生代。希望“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的后续品种顺利出版，也希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在这一领域耕耘开拓。还有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这些德语文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对史学界同仁也不无裨益。

一十三年十卷书

读《史料与阐释》第十辑

陈思和

《史料与阐释》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成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意向策划于2007年，正式创办于2011年，依靠了学校“985三期”“双一流”学科建设的经费资助，磕磕碰碰坚持了13年，如今一共编出九辑，第十辑也问世在即。敝帚自珍，同仁们希望我为第十辑写几句话。虽然只有区区十卷书，十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规模，不过我们——不仅是我们学科的同仁，还有学界从事史料研究的朋友们，都很认真地哺育它、抚养它，为它付出了心血和辛苦。现在主持这项工作的两位负责人都向我提出邀约，我想，只能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起初的计划中，《史料与阐释》是一个不定期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成果的集结，现在仍然是这样。说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弱点。首先是不定期，原则上我们集稿成熟一本出版一本，不急于追赶出版周期，因为体量小，一本集刊差不多达到50多万字的篇幅，邀集了好稿不容易，何况出版周期过长，许多稿子不得不中途退却，转发他刊。但是这样也慢慢地凝聚起一批不那么急功近利，愿意做长期研究规划的朋友，他们写稿并不急需达到的功利目的，只是为学术积累而做研究，而蒐集资料。他们给《史料与阐释》长期投稿，没有什么功利企图；而我们手里攥着双方心血之稿，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这两者是出于互相信任和学术兴趣，走到一起来了。其次是自我定位。《史料与阐释》开始就定位于一本不定期的学术集刊，它不是期刊，更不是高校评价体系中的核心期刊。这也许会使很多在高校里疲于内卷的学人不屑一顾，也无暇顾及，反过来，我们也省去了许多不得不面对的人情稿。潜心做史料研究，本来就是寂寞的、个性的、细琐的，荒山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既不必成为朝市之显学，也不必成为赶时髦之俗学。以刊登文献史料为主的书刊，唯有求真，唯有做实，朴朴素素，信服于人，便是正道。所以在《史料与阐释》创办之初，我就不指望它成为理论建构的巍峨大厦，去承担传播真理之千秋大业，只要能刊登一些扎实可信、分量充足的材料，能做到认真发掘史料、辑录佚文、整理目录、考辨文献、编制年谱等等，足矣。用当年傅斯年说的俏皮话，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不过傅斯年还有一句话更为要紧：“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这句话出自1928年傅斯年所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差不多近百年过去，这句话放在今天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新媒体、人工智能、遗传基因等等现代科技的大背景下，自是别有一番意味。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上许多云遮雾障之谜，因现代科技的力量而真相大白。就现代文学学科而言，虽然只是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格局下的沧海一粟，同样能深刻反映这一时代变化的信息。随着近现代文献数据库以及网络工具的普遍应用，以前难以寻找的珍稀书刊现在唾手可得，历史真相很难再被深埋在天禄秘籍而不见于世。新世纪以来，学术领域风气渐有变化，重视史料文献成为许多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学者申请国家项目的必要前提，追踪经学之论逐渐让位给实证考据的新材料新发现。这是当前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最大趋势。记得40多年前，学术领域百废待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集中全国高校学者之力，在废墟上建设学科，策划编辑了百余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不但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也在全国高校里培养了一批学有专攻的学术中坚。没有这样一个坚实基础，就很难会发生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的盛况和“重写文学史”理念的崛起。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史料学热，虽然还居于青萍之末，但有了现代科技手段助力推动，史料发掘更为完整、深入、优质，更加有助于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对盲目迷信的破除，因此，随之而来的学术盛兴可以想见。《史料与阐释》将在这样一个良好学术氛围下做出自己特色的努力。

现在回到《史料与阐释》第十辑。这一辑的主打内容是周氏兄弟的年谱编撰。缘于去年4月，杭州师范大学举办一个主题为“中国现代作家年谱的编撰：方法、问题、前景”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以周氏兄弟年谱为讨论中心，涉及中国现代作家年谱、传记编撰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与会学者各抒己见，介绍各自的编撰实践与经验。会议讨论的周氏兄弟年谱以及与会者的发言，第十辑都有完整刊发。我没有参加会议，只是读了这篇内容，不由生发出一点感想：我以为编撰作家年谱，因为谱主身份是作家，与一般谱主不同，难点在于如何呈现他的文学创作。如果仅仅记载作家的发表时间和刊物，或者仅仅记载作家本人对作品的言说是不够的。最难掌握的是介绍作品内容和艺术特点的详略分寸。太详细超越年谱功能，喧宾夺主；太略又无法突出谱主的价值所在，“全人”风貌必流于琐碎。有的撰述者以记录谱主原话为主，这没有问题，但对文学作品的介绍概述，尤其是对艺术特色的把握，当有撰述者独特见解，不做人云亦云，这是最见撰述者解读书本功力之处。周氏兄弟同为文学大家，他们的创作，译并注重、意境深邃，是读者渴望了解的主要内容。不能因为他们创作成就为学界熟知而放弃了撰述者的独特心得。其次，撰述者的年谱，不能与谱主日记、书信等同，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现在材料发现、运用都得到普及，读者阅读年谱的同时也可以读谱主日记书信，但两者阅读功能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作家的日记、书信都是编制年谱的基础，不必事事必录，日记可以琐碎，年谱不能太琐碎，而年谱对日记书信的取舍，当取决于撰述者的研究视野和主观导向，绝不是有闻必录、臃肿即丰。由此看来，撰写年谱的主体性是无法回避的，谱主行状的孰取孰舍、著述的概述介绍、原始材料的辨真真伪，都是撰述者学术能力的真实考量。理论上说，一个谱主可以有多种年谱，异处不在资料多寡，而在于编撰者呈现给读者的不同的谱主风貌。其三，编撰年谱有简谱和长编之分，其差别主要不在正文的内容，而在于资料附录的多少。一般年谱长编，可以将相关材料尽可能丰富地附录于后，让读者知道正文内容的来源，以便检验撰述者判断是否准确；更有甚者，撰述者可以将资料的考辨过程再附录于后，作为笺注。而简谱，为节省篇幅起见，就以正文条目为限，只要指出资料来源，其余皆略。所以，同一本年谱，简谱为核心，长编当视篇幅而定。

关于年谱问题，就谈些外行的意见，未必深思熟虑，仅供撰述年谱者参考。

一十三年十卷书，整整齐齐陈列于书架，颇为雄壮。我曾经负责了《史料与阐释》前五辑的编辑工作，后来虽然还与王德成兄同列主编之名，具体工作则由年轻的同仁负责，不问世久。这次为写这篇短文，又把十辑目录温习了一遍，也有感慨。特别要感谢十三年来坚持在《史料与阐释》写作的几位老作者。首先是晓风女士，她贡献了极为珍贵的全部胡风日记（1937年8月13日—1985年6月8日）；因为这部日记，又引出了许俊雅教授长达20万字的《胡风日记阅读札记》（1937年8月13日—1938年9月28日），先在集刊连载，后又正式集结出版（书名《胡风日记疏证》）。可以说是一段跨越海峡的学术佳话。秋石先生也是我们的老作者，他的新作《〈八月的乡村〉构建之探赜索隐》指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本还有一个为人不知的来源，即来自亲历南满人民革命军英勇斗争的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傅天烈士讲述的一部“腹稿”，以此补充了已经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相关内容。还有李振声先生，他在我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雪中送炭，赐予两篇长文，一篇《谁愿意向美告别？》，分析诗人彭燕郊的作品，还有一篇《外来思想与本土资源是如何转化为中国现代语境的？》，讨论了刘师培的《中国民约讲义》，两篇都是极有见解的学术论文，振声兄丝毫没有嫌《史料与阐释》不是C刊，从高校评估体系上说，也许刊登了也是“白登”，他却丝毫没有犹豫，愿以最好的作品与我们相濡以沫，一起努力和追求。



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